

刍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文化交流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陈 锴*
(CHEN Kai)

摘要

作为“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连接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的跨国经济走廊。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文化交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南半岛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发展，也有利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双方文化交流主要成绩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与中南半岛文化交流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初步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文化交流、中南半岛国家、中国、初步对策

Abstract

As one of the six economic corridors of the “Belt and Road”, China-Indochina Peninsula economic corridor links China with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such as Thailand, Singapore, Malaysia, Vietnam, Myanmar, Laos, and Cambodia.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have brought significant results. This not only promotes the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Indochina Peninsula, but also builds a China-ASE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main outcome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explores the most critical problem fac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advances the preliminary solution.

Keywords: cultural exchange,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China, preliminary solution

* 陈 锴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电邮地址：kaichen@xmu.edu.cn

一、前言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南半岛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度。比如，作为“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之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中国广西南宁和云南昆明为起点，以新加坡为终点，纵贯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黄艳梅、林艳华，2016）。

随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深入，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文化交流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本文着重分析双方在教育交流和广播影视交流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发现了当前中国与中南半岛文化交流存在的部分问题，并提出初步的应对之策。

（一）教育交流

1. 学历教育

中国一直致力于扩大中南半岛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的规模，从而加深其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使其成为增进未来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中国一方面在推进涵盖中南半岛国家的双、多边协议，比如，《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2016-2020）》《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国—东盟教育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0》等。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履行与中南半岛国家签署的双边高等教育合作协议。例如，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签署的《教育交流协议》，以及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签署的《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可以说，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教育合作在创新中不断丰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来华留学排在前15位的国家中有4个中南半岛国家，分别是泰国28608人、老挝14645人、越南11299人和马来西亚947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不断加强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教育合作，“尤其注重加强与泰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据统计，“2015年，云南省42所高校招收来自88个国家的留学生12078人”。其中，“泰国留学生占了1/6”。云南财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清迈大学、宋卡王子大学、孔敬大学等40余所泰国学校、教育机构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或备忘录，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了联合培养、短期培训、师生交流、研讨会、论坛等一系列合作项目（刘艳琴、李沙青，2016）。云南已有28所高校开设了泰语课程，滇泰高校合办了两所孔子学院，滇泰高校“2+2”联合办学项目也受到学生的欢迎。起步较早的云南大学，已与宋卡王子大学、锡伯康大学和清迈大学在汉语、泰语教育等领域展开密切合作（张丹，2017）。

中国不仅加大对中南半岛国家来华留学生的重视程度与扶持力度，还通过增加对留学生的补贴、出台相关的留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保障政策等措施，鼓励在国内校大学生去中南半岛国家留学。从长远来看，“就相当于培养了一批了解外国文化的专业性人才，在留学期间，这些留学生在学习别国文化的同时也在传播本国文化”（祁彩玲2019：9）。

中国是泰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比如，2016年，中国在泰留学生3.1万人。同年，泰国在华留学生2.1万人，泰国位列中国第三大留学生来源国（宁赋魁 2017：51）。在泰国，有13所中国教育部认可学历的高等学校（曾征、杨红娟 2017：67）。另据报道，在桂林理工大学，柬埔寨一个家族11个人先后到该校留学的事，被传为美谈。

最初是2008年，家住柬埔寨金边的杨德裕，认为“学好汉语好找工作”，便选择到桂林理工大学留学。看到大儿子经过留学，汉语说得好，成绩也优秀，杨德裕的爸爸先后把其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送到桂林理工大学，而杨德裕的表哥、表弟、表妹、堂弟、侄儿等，也在他的“示范”下，先后跟着到桂林留学。6年间，杨德裕家族中先后有11人到桂林理工大学求学（蒋晓梅，2016）。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之间，除了互派留学生，中国的高校还陆续在中南半岛国家建立分校向当地学生授课，而学位由设立海外分校的中国高校负责授予，比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老挝苏州大学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其中，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设立了多个多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且具有相对独立的办学校区和稳定的师资队伍，招生规模较大。其他办学机构均是以外方合作高校下属二级机构的形式设立（郭强 2019：29-30）。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堪称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开创了中国高校走出国门办学的先河。

在马来西亚，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是中国第一所高校全资设立、具有独立校园的海外分校。2017年，福建省政府专门设立“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福建省政府奖学金’”，旨在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实施输送更多高素质国际化人才（杨颖、王荣华，2020）。同时，该校还获得了马来西亚华侨的巨额捐助。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曾捐赠1亿马币，用于修建图书馆；马来西亚新阳光集团等一批华人企业也给予鼎力支持和帮助（郭强 2019：32）。该校于2014年10月17日正式开工建设，2016年2月22日迎来首批新生。该校的教育层次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生源将主要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各国），分校将努力成为一所教学与科研一流、融合多元文化的国际性大学（叶雨婷，2017）。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目前有12个专业，包括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中医学、中文、金融学、国际商务等。教育层次包括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将获颁厦门大学学位，享受马来西亚政府和中国政府双重认证，并拥有在两国就业或升学的机会（赵秀红，2017）。据统计，该校的首批马来西亚籍学生就业情况良好，绝大多数已入职行业领先的公司，如德勤、普华永道、星洲媒体、马来亚银行、花旗银行和大华银行等。

再以老挝苏州大学为例。2011年，苏州大学在老挝创办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境外大学老挝苏州大学。该大学与老挝科技部合作共建“中老绿色丝绸研究中心”和“现代蚕桑生产技术与发展模式示范园”，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张东润等，2020）。相比之下，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正在为柬埔寨当地经济社会提供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支撑。该学院由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与红豆集团联合申

办，于2019年12月16日正式开学。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不仅是中国在柬埔寨创办的第一所中文大学，还是中国首家中国高职院校在海外独立设置的应用本科大学，首家校企合作股份制大学。

2. 非学历教育

在非学历教育方面，中国倡导的孔子学院也有力推动了中南半岛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据中国国家汉办的官方统计数据，在中南半岛国家中，泰国设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最多，有孔子学院14所，孔子课堂11所。缅甸、柬埔寨、新加坡均设有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马来西亚、老挝、越南有孔子学院，但无孔子课堂；缅甸、柬埔寨、新加坡、老挝、越南各有一所孔子学院（曾征、杨红娟 2017：64）。

在中南半岛国家中，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已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孟凡璧，2020）。

先以泰国为例。泰国是中南半岛国家中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最多的国家，分别为14所和18所。其中，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院与泰国教育部合作建立的“本土化汉语教师培训基地”，承接了大量泰国教育部在职本土化汉语教师的培训项目，并首创“泰国本土汉语教师长期培训”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全过程地建立了本土汉语教师培训体系（赖林冬 2017：40）。作为越南的第一所孔子学院，河内大学孔子学院一直致力于开展汉语教学。自2014年12月成立以来，截至2019年11月底，该院汉语学员人数累计达1772人，近2.9万人次参与了该院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王迪、陶军，2019）。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山东大学于2007年7月14日合建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同年，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了“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基金”，并设立了“南洋华文文学奖”（目前奖金最高的本地华文文学奖），旨在遴选华文文学佳作，并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多年以来，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培养当地华文教师（余可华 2017：83）。与新加坡相比，马来西亚的孔子学院采用了新颖的合作办学模式。比如，成立于2019年12月的马来西亚沙巴大学孔子学院是一所工程技术类的孔子学院。该学院不仅教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也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技术人才培训（陈悦，2019）。

与上述四个中南半岛国家相比，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尚未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但是当地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依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于2010年正式成立，不断扩大办学规模，累计注册学员超过2.2万人。同时，该学院还为老挝政府部门开设汉语培训班，与中资企业合作培养特殊专业人才，并培训本土汉语教师（章建华，2020）。

再以柬埔寨为例。从2010年开始，国家汉办与柬华理事总会合作，派遣志愿者赴其所属高校任教。他们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当地教授中文，也是在弘扬中华文明与文化传统，促进中国与柬埔寨民间交往”（张志文，2016）。

另据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夏修龙向《中国青年报》介绍：

我们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点覆盖面很广，甚至在总理府、参议院、劳工部等众多部门，在国防部、陆军学院、金边警备旅、特种伞兵部队等，都开设

了汉语班。在柬埔寨亚欧大学、棉芷大学等，我们还开展了汉语本科学历教育。在中学、企业、协会也设立了不少汉语教学点（蒋天，2017）。

需要强调的是，2017年7月12日，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在柬国防部开设了汉语中心，帮助柬官兵学习汉语。其中，“柬国防部汉语中心首期招收学员60名，每周一至周五授课”。此前，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已在柬军队系统中的陆军学院、伞兵部队、王家军医院等开设了汉语教学点（毛鹏飞，2017）。此外，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还协助柬埔寨的亚欧大学设立了中文系，并派出多名中方教师承担华文教学工作。据报道，“学员经过4年正规学习，可以拿到柬埔寨教育部承认的本科文凭”（蒋天，2017）。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的孔子课堂是中国高校与缅甸国内私立教育机构合作建立的，属于非官方性质，并未得到缅甸政府经济上的支持及制度上的保障（刘红娟 2020：34）。

（二）广播影视交流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广播影视交流，一方面涵盖了跨境采访、巡演展播、购买时段和租用频道等传统方式，比如，广西的广播电视媒体通过开展联合报道、节目交换、合作制片和频道落地等方式，先后与老挝、泰国、缅甸、越南等国的广播电视媒体签订协议（谢卓华 2016：35）。比如，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在越南、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等中南半岛国家设立了工作站，广西电视台与泰国东盟卫视开展合作，有效地实现了“本土化”传播（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学习中心组，2017）。另一方面，中国还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媒体合办电视栏目，将中国优秀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和纪录片翻译并配音本土化。

早在2014年10月，由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合办的《中国剧场》栏目正式在柬埔寨国家电视台推出，每周四、周六17:00固定时间在柬埔寨国家电视台一频率播出（广西社会科学院 2012：577）。柬语版《三国演义》是《中国剧场》栏目最早播出的电视剧，在柬埔寨国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受到高度关注。在柬埔寨国家电视台举办的收视问答活动中，短短一个月就收到近两万条参与短信，如此高的参与度在当地并不多见（凌晨 2018：26）。

无独有偶，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与老挝国家电视台于2014年11月，签署了《中国剧场》栏目合作协议，并成立了译制工作室（章建华，2016）。2015年4月25日，举行《中国剧场》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的启播仪式，由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译制的电视剧《野鸭子》（老挝语版）在老挝国家电视台播出。2015年8月15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负责译制的电视剧《时尚女编辑》（老挝语版）在老挝国家电视台《中国剧场》播出。2016年，《中国剧场》栏目在柬埔寨、老挝播出了中国优秀电视剧《爱的多米诺》（35集）（柬埔寨语版、老挝语版）、54集电视剧《琅琊榜》（老挝语版）、148集电视剧《少林寺传奇》（柬埔寨语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8：110）。

《中国剧场》栏目旨在与柬埔寨和老挝等国媒体联合译制推广优秀中国影视剧，由对象国翻译译审，聘请对象国知名演员或配音演员配音，呈现给当地观众的是他们熟

悉的声音与地道的语音。2016年,该栏目被列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重点项目。

通过翻译,两种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原有的文化因子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并与新的文化因子结合,因而常常碰撞出创新的火花(党莉莉、马萧 2019: 139)。2017年4月9日,中柬合作建立的卫星电视台NICETV,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试播。NICETV由柬埔寨王国国内政部与中国新影响文化投资集团共同建设并运营,是第一个由中柬双方共同合作的卫星电视频道(佚名, 2017)。2017年8月22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与缅甸国家广播电视台合作的《中国电视剧》栏目正式开播,这是中国媒体与缅甸国家广播电视台首次以固定时间、固定栏目的合作方式开办电视栏目。缅甸成为广西人民广播电台与东盟各国电视媒体开展影视剧译制合作的第三个国家(凌晨 2018: 24)。

中国影视作品在中南半岛国家的受欢迎程度也与日俱增。比如,2020年1月14日,“2020中国影视节”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展中心启动。通过此次影视节,由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精心挑选的7部电影、11部电视剧及15部记录片将于同年在马来西亚上映,其中包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制作的纪录片《光阴的故事——一切水不断》,以及中国驻马大使馆聘请专业团队译制配音的剧集《遇见幸福》(郁玮, 2020)。马来西亚星报媒体集团Dimsum平台调查了该平台最受观众欢迎的20部影视作品,其中70%来自中国,中国的古装剧、现代剧都很受当地观众欢迎(张婧, 2019)。无独有偶,在越南本土的视频网站BiluTV和FPT Play上,中国国产剧几乎占据半壁江山,《上阳赋》《有翡》等网剧深受当地年轻观众的追捧(光明, 2021)。

与此同时,中国继续从中南半岛国家引进优秀的影视剧。2015年至2019年,中国广播电视机构共引进东盟国家影视剧64部,网络视听机构共引进东盟国家影视剧134部,其中泰国、新加坡是最大片源国(黄庆刚, 2020)。中国引进播出的首部泰剧,可以追溯至2003年在中央电视台八套海外剧场播出的泰剧《俏女佣》。此后,中央电视台八套又陆续播出了《凤凰血》《卧底警花》等泰国影视作品,为引进泰国影视剧奠定了契机(杨莲洁, 2019)。再以新加坡为例。爱奇艺与长信传媒联合改编和翻拍“南洋三部曲”,即《小娘惹》《南洋女儿情》《南洋英雄泪》,未来计划还包括翻拍新加坡的其他电视剧(王英敏, 2020)。

二、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差强人意

虽然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文化交流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文化交流中还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中,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相对不足。

需要说明的是,越南的国语是越南语,柬埔寨的官方语言是高棉语,老挝通用的语言是老挝语,缅甸的国语是缅甸语,泰国的国语为泰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国语都是马来西亚语。为了促进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要培养既熟悉中国国情、主张和政策,又精通当地语言、文化、政治、历史等的高层次外语人才”(孙吉胜 2016: 56)。可以说,借助非通用语种人才,不仅可以与当地民众之间建立

经常性的沟通和良性互动，还可以拉近与当地人的感情距离。否则，容易导致文化误解，甚至造成文化交流的失误。

先从“一带一路”的大范畴来看，中国培养的非通用语种人才是严重不足的。据统计，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世界各国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种类有8752种，平均每年1750种，涉及语种为52个。值得注意的是，“使用这些语言翻译中国内容图书，绝大多数依赖的是版权引进国家的翻译，对于内容的精准度我们很难把握。而我国对于许多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完全不能满足国际交流和出版文化传播的需要”（聂震宁 2016: 6）。

再看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文化交流，能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的人相对不足。

尽管中方人员可以用英语和当地的精英沟通，但是，无法与当地不通晓英语的民众进行沟通，易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许多文化交流工作无法展开。具体表现为，不太善于针对特定的受众群体推进民心相通，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意愿不强，侧重于当地的精英阶层，对做好与当地民众的文化交流工作不够重视。正如缅甸驻华大使吴帝林翁所言：“现在有很多中国人不了解缅甸，缅甸的民众也不够了解中国，如有机会让两国人们坐在一起，把内心最深处的思想互相交流，自然可以促进他们互相了解”（刘旭，2017）。

假如在推进文化交流时只是考量精英阶层的意见和建议，缺少当地民众的直接接触和参与，这会影响文化交流的纵深推进，也难以让当地社会会和民众真正获得文化交流产生的益处。另据中国学者在越南的实地调研显示：“除少数研究中国问题的越南学者外，其他人极少了解‘一带一路’。越南普通民众对‘一带一路’及相关的问题更是缺乏了解，大多数民众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抑或只是听过‘一带一路’这一概念，而具体要做什么，他们不甚明了”（顾强 2016: 101）。

近年来，中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加大力度在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一带一路”各国的语言与文化专业，编纂各国语言志和词典，从战略人才高度进行非通用语种的发展，为文化交流和熟悉对方的习俗、宗教、法律提供语言人才基础。目前，基本可实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全覆盖（秦德君，2020）。

与此同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所高校也在加速建设“非通用语种”。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在2020年开设100多种外语课程，覆盖所有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刘欣路、许婷 2017: 11）。广西民族大学于2016年打造了《老挝语语音》《基础缅甸语》《印尼语语音》等5门慕课（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2017年，该校开始推“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方法，利用网上教学平台开展教学方法改革试点，实现了线上自主学习和线下课堂教学相结合（蒋晓梅，2020）。但是，“非通用语种”课程建设不能等同于“非通用语种”人才产出（刘欣路、许婷 2017: 11）。

目前，国内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可以用“差强人意”四个字来形容。近年来，虽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非通用语专业分布不均。比如，王雪梅与赵双花研究了中国的九所传统外语类院校的招生数据，即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非通用语种专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地处东北、西北、西南地区的外语类院校非通用语种专业相对匮乏，且专业相似度高（王雪梅、赵双花 2017：94）。部分非通用语专业存在师资匮乏，青年教师比例过高，学历职称层次低，学缘结构单一，科研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部分高校甚至出现1-2个本科毕业生就开设一个新专业的现象（韩亚文 2019：29）。

其二，非通用语种的专业设置和教学有待改进。国内在本科层次开设的非通用语专业已近百种，仅有泰语、越南语、朝鲜语、意大利语4个语种设有翻译硕士专业（董希尧 2020：102）。以泰国语为例。泰国语的课程设置主要围绕听、说、读、写、译等为主。这将导致学生仅能掌握语言本身的知识，缺少诸如科技、管理、法律、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知识，无法满足用人单位和跨文化交流的需求。长此以往，学生将失去学习跨文化交际的兴趣和动力（胡纯、陈茜、张吟松 2020：179-180）。从长远来看，“虽然中国不少大学（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等）也培养了这些语种的人才，但这些人进入学术界并成为东南亚研究的主力的仍然偏少”（饶兆斌 2017：122）。

其三，部分非通用语种专业学生的就业率较低，且部分非通用语毕业生的工作与所学专业不对口。近年来，国内部分高校的一些非通用语专业面临降分录取或停招的窘境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韩亚文 2019：29）。以广西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外国语学院开设的中南半岛国家非通用语种课程比较齐全，分别由泰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和缅甸语。但是，广西其他高校开设的相关课程局限于越南语和泰语，部分高校甚至没有开设中南半岛国家非通用语种课程（易春燕、卢慧慧 2019：96）。

三、初步对策

综上所述，非通用语种人才的相对不足，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从短期来看，无法满足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文化交流的需求。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形象。

要改善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相对不足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国内各高校将语言教学和区域研究或国别研究结合起来。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的外语教学和区域研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比如，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与培养中南半岛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外语院校（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是分开的。这种情况下，这些外语院校培养出来的非通用语人才，多数并未从事与中南半岛国家相关的学术研究，而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则相对缺乏懂当地语言的人才。笔者估计，要解决这一问题，国内各高校需要先达成一定的共识。可是，要达成这样的共识，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四、结语

本文在分析双方文化交流主要成绩的基础上，发现了当前中国与中南半岛文化交流存在的主要问题，即非通用语种人才的相对不足。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需从制度层面寻找对策，因为中国大学的外语教学和区域研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假如在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时，未能将语言教学和区域研究（或国别研究）结合起来，那么非通用语种人才的相对不足还会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 陈悦, 2019, 〈东马来西亚第一所孔子学院揭牌〉, 中国新闻社, 12月12日。
- 党莉莉、马萧, 2019, 〈“命运共同体”倡议下翻译工作必将大有可为〉, 《人民论坛》, 第33期, 页138-139。
- 董希骁, 2020, 〈我国非通用语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期, 页99-106。
- 顾强, 2016, 〈越南各阶层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态度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对越南进行的实证调研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第5期, 页97-109。
- 光明, 2021, 〈国产剧靠什么吸引海外观众〉, 《泉州晚报》, 1月28日。
- 广西社会科学院编, 2012, 《2016年广西蓝皮书广西文化发展报告》,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理论学习中心组, 2017, 〈着力提升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 《广西日报》, 4月19日。
-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 2018, 《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报告2015-2016》,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郭强, 2019,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高校境外办学路径研究〉, 《教育评论》, 第3期, 页28-32。
- 韩亚文, 2019, 〈非通用语人才培养不宜一窝蜂〉, 《当代外语研究》, 第1期, 页28-29。
- 胡纯、陈茜、张吟松, 2020, 〈基于云南高校的泰语教育与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探究〉, 《智库时代》, 第10期, 页179-180, 283。
- 黄庆刚, 2020, 〈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化影视合作助推民心相通〉, 新华社, 11月24日。
- 黄艳梅、林艳华, 2016, 〈综述: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加速推进〉, 中国新闻社, 5月26日。
- 蒋晓梅, 2016, 〈12年间到广西留学的东盟国家学生由1434人攀升至8000多人, 柬埔寨“一家”11人留学广西成美谈〉, 《南国早报》, 9月12日。
- 蒋晓梅, 2020, 〈去年东盟国家在广西留学生超万人〉, 《南国早报》, 11月30日。
- 蒋天, 2017, 〈结合“一带一路”在柬埔寨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青年报(数字报)》, 5月10日。
- 赖林冬, 2017,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孔子学院的发展与创新〉, 《南洋问题研究》, 第3期, 页37-52。
- 李沙青、陈鑫龙, 2016, 〈孔子学院大会缘何落户云南〉, 《云南日报(数字报)》, 12月10日。
- 凌晨, 2018, 〈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浅析〈中国剧场〉系列栏目在东南亚的传播策略〉, 《中国广播》, 第1期, 页23-26。
- 刘红娟, 2020, 〈缅甸两国华文教育发展比较及启示〉, 《八桂侨刊》, 第2期, 页30-40。
- 刘欣路、许婷, 2017, 〈民心相通需要“小语种”的支撑〉, 《对外传播》, 第4期, 页10-12。
- 刘旭, 2017, 〈缅甸驻华大使: 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重在民心相通〉, 中国新闻社, 5月13日。
- 刘艳琴、李沙青, 2016, 〈滇泰教育合作再升级〉, 《人民日报海外版》, 8月2日。
- 毛鹏飞, 2017, 〈柬埔寨国防部汉语中心揭牌〉, 《解放军报》, 7月13日。
- 孟凡璧, 2020, 〈后疫情时代东盟国际中文教育的着力点〉, 《中国教育报》, 8月24日。
- 聂震宁, 2016, 〈关于制定“一带一路”出版业走出去相关规划的思考〉, 《科技与出版》, 第10期, 页4-7。
- 宁赋魁, 2017, 〈推动东盟互联互通, 对接“一带一路”〉, 《中国投资》, 第4期, 页50-52。

祁彩玲, 2019, 〈略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心相通〉, 《昌吉学院学报》, 第3期, 页6-9。

秦德君, 2020, 〈更好展现负责任大国国家形象〉, 《深圳特区报》, 11月10日。

饶兆斌, 2017, 〈“民心相通”的挑战: 以中国和东南亚的知识界/学术界为例〉, 王灵桂、赵江林主编, 《全球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吉胜, 2016, 〈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与“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 《公共外交季刊》, 第3期, 页53-59, 124-125。

王迪、陶军, 2019, 〈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庆祝成立5周年〉, 新华社, 12月15日。

王雪梅、赵双花, 2017,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校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 现状、问题与对策〉, 《外语电化教学》, 第2期, 页91-96。

王英敏, 2020, 〈继小娘惹后爱奇艺或翻拍更多本地经典剧〉, 《联合晚报》(新加坡), 7月19日。

谢卓华, 2016, 〈“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对接东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 第3期, 页34-38。

杨莲洁, 2019, 〈泰剧成翻拍香饽饽, 仅因不再“狗血”?〉, 《新京报》, 7月11日。

杨颖、王荣华, 2020, 〈面朝大海 行远同梦〉, 《福建日报(数字报)》, 10月12日。

叶雨婷, 2017, 〈海上丝绸之路教育的福建样本〉, 《中国青年报(数字报)》, 6月5日。

易春燕、卢慧慧, 2019, 〈广西面向东盟的外语教育服务产业现状调查〉,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9期, 页96-99。

佚名, 2017, 〈中柬合作电视台试播〉, 《澳门日报》, 4月10日。

余可华, 2017, 〈新加坡华文教师教育及其启示〉,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第5期, 页75-86。

郁玮, 2020, 〈马来西亚“2020中国影视节”启动仪式在吉隆坡举行〉, 新华社, 1月15日。

张丹, 2017, 〈滇泰200余位教育界人士共商高等教育创新合作〉, 中国新闻社, 6月27日。

张东润、王俊杰、徐瑞雅、孟旭, 2020, 〈以高水平国际化带动大发展〉, 《新华日报》, 10月16日。

张婧, 2019, 〈国产剧出海: 长风破浪会有时〉, 《中国文化报(数字报)》, 7月24日。

张志文, 2016, 〈中国志愿者接力在柬埔寨服务——用青春奉献夯实中柬友谊〉, 《人民日报(数字报)》, 9月27日。

章建华, 2016, 〈广西电台与老挝国家电视台合办动漫栏目开播〉, 《中国文化报》(数字报), 10月24日。

章建华, 2020,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10“岁”了〉, 《城市金融报》, 11月6日。

赵秀红, 2017, 〈厦大“出海”记——走访中国第一所建海外分校的大学〉, 《中国教育报》, 6月10日。

曾征、杨红娟, 2017, 〈东南亚地区孔子学院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第3期, 页63-7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2019年4月12日。